论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五维建构

刘兴国，赵书昭

（天津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57）

摘要：李大钊的民族复兴思想历经了萌芽期、塑型期和成型期三个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成果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对自己先前提出的“中心势力说”“民彝说”“调和互助说”“第三种文明说”“新亚细亚主义说”等理论观点进行了扬弃，科学回答了实现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实现路径、制度选择和世界意义等五个维度的理论问题，完成了其民族复兴思想的基本建构。

关键词：李大钊；民族复兴；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6)01－0009－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6.01.002

The Five-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Li Dazhao’s Thought 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LIU Xingguo，ZHAO Shuzhao

（School of Marxism，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ianjin 300457，China）

Abstract：Li Dazhao’s thought 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germination，formation and maturation. It is one of the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result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Li Dazhao critically adapted his previous theories such as the “Theory of Central Force”“Theory of the People’s Will”“Theory of Mutual Adjustment and Assistance”“Theory of the Third Civilization”and“Theory of New Asianism”，and scientifically answered five key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leadership force，the relying force，the realization path，the institutional choice and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achiev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us，he completed the basic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his thought 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Li Dazhao；national rejuvenation；Marxism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1]李大钊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不甘心神州陆沉，高呼“青春中华”“中华再造”“吾民族复活”等民族复兴口号，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投

收稿日期：2024－05－1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2YJA710055)

作者简介：刘兴国(2001－)，男，甘肃白银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赵书昭(1980－)，男，河北乐亭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身于革命实践，为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奋斗终身。在中华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相继影响下，李大钊的民族复兴思想历经了萌芽期、塑型期和成型期三个历史阶段。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对自己先前提出的“中心势力说”“民彝说”“调和互助说”“第三种文明说”“新亚细亚主义说”等理论观点进行了扬弃，科学回答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实现路径、制度选择和世界意义等五个维度的理论问题，完成了其民族复兴思想的基本建构。

一、从“中心势力说”到无产阶级建党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

究竟谁才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领导力量？

青年时期的李大钊曾寄希望于“当世贤豪”“党界诸君子”“文豪”“群枢”等社会精英群体。但事实证明，这些社会精英群体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无法承担起民族复兴这一历史重任。面对国家积贫积弱、政令不畅和一盘散沙的局面，李大钊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中提出了“中心势力说”，该观点证明李大钊已经强烈意识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要有一支坚强的领导力量，即“中心势力”。

李大钊认为“中心势力”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是具有凝聚国家力量、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作用。所谓“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否则，分崩离析，扰攘溃裂，无在不呈兀臬之象，久而久之，且濒于灭亡之运焉”[2]174。二是内部要团结统一，并且要有“中心人物”。三是以中级社会为主体并得到人民支持。所谓“此之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2]175。可见，李大钊对于“中心势力”的探寻呈现了一个从上层社会到中层社会再到基层社会的变化轨迹，也印证了真正的革命力量来自底层劳苦大众的真理。

李大钊最终能够把“中心势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无产阶级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历史必然。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欧洲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这使得李大钊敏锐地将目光从欧美转移到了苏俄，从民主主义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促使他心目中的“中心势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了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布尔什维克党体现出来的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让李大钊真正认识到了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进政党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正如他所指出的，“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2]329；“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3]348。

因此，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对“中心势力说”进行了彻底的扬弃，实现了从“中心势力说”到无产阶级建党思想的飞跃。首先，李大钊将“中心势力”的阶级基础从“中级社会”转移到无产阶级，尤其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进而形成了初步的无产阶级建党思想。他指出：“C 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3]350 其次，他认为“中心势力”必须以先进政党的形式出现。面对民国时期混乱的政党政治，李大钊严厉地批判道：“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3]349 为了改变中国革命运动虎头蛇尾的宿命，他决心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并将其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指出“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3]350。再次，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单枪匹马、脱离群众，否则就无法领导革命取得成功。正如李大钊自己所说：“没经过民众运动的人

民，团体的训练是不会发达的；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3]349

综上，李大钊实现了从“中心势力说”到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的理论跃迁，并与陈独秀等志同道合者共同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自发寻找“中心势力”到自觉创造“中心势力”的转变。

二、从“民彝说”到人民史观——科学回答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依靠力量

谁才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真正的依靠力量？

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期间与友人共同创办了《民彝》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民彝说”。“民彝”来自《尚书·康诰》中的“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之语，并与“宗彝”相对立。李大钊赋予了“民彝”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蕴，主要体现在：一是中西优秀文化因子相结合的产物。“民彝”既包含了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的思想，也蕴含了道家守静无为、自治自理的意蕴，又汲取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民主自由等思想，尤其是托尔斯泰的群众观。对此，李大钊提出了“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的重要观点。二是体现了先验论的特点，其哲学基础仍属于唯心论范畴。李大钊赋予“民彝”天赋性和神圣性，指出了“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民之秉彝，好是懿德”[4]267，也就是说“民彝”是与生俱来的禀赋，并非后天形成。这说明此时的李大钊尚且不能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分析“民彝”形成的原因。三是具有价值判断功能和政治目标至上性的特点。李大钊认为“民彝”是道和器的统一体，具有权衡事理、辨别是非、权衡利害的功能。同时，在他看来，“民彝”是近代民主政治追求的至高境界。正所谓“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4]270。

总而言之，李大钊将衡量道义的圭臬从“宗彝”转向了“民彝”，体现了反封建和反专制的进步意义。虽然“民彝说”的哲学基础属于唯心论范畴，其包含的托尔斯泰的群众观距离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有一定距离，但却为李大钊在社会历史观上进一步靠近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李大钊对人民群众作为民族复兴伟业依靠力量的认识，既来源于科学理论，也求证于社会实践。“人民群众”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心中的“民彝”思想之火并没有熄灭，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逐渐实现了理论的升华和飞跃。建党之后，李大钊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亲自组织各类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李大钊尤其重视农民运动，他深入调查研究并相继撰写了《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章，深刻揭示出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阶级现状和主要矛盾，呼吁把农民真正动员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我党在北方白色恐怖下的农村革命力量的发展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

风起云涌的革命实践逐渐证明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力，也证明了无论是怎样的政党，如果脱离人民群众搞革命，都注定会一事无成。铁一般的事实使李大钊更加坚定了对民众力量的崇敬与认可。因此，李大钊的人民史观在其1924年发表的《史学要论》中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成熟和鲜明。他指出：“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5]568 可见，只有把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并引导人民迸发出磅礴的历史伟力，才能救亡图存。此时，李大钊不仅实现了从“民彝史观”向人民史观的转变，更是亲自领导了工运、农运、学运、兵运等革命活动，做到了知行合一。他深刻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具有作为革命领导者的资格，同时又将目光投向广大农村，发展北方农民运动，倡导青年人到农村去，从而实现劳动人民的大联合。

相比于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势力对待人民群众要么利用、要么提防、要么蔑视的态度，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则真正将广大人民群众视为

革命事业的主体力量,甚至是革命事业的目的本身,这体现了人民史观对“民彝说”的超越与升华。历史证明,凡是将人民视为工具且将追求自己的利益视为目的的政治集团,都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宿命。因为,只有中国人民才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依靠力量。

三、从“调和互助说”到社会革命观——科学回答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路径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需要走什么样的路径?

改良还是革命?不同的路径选择成为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分裂的重要原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章士钊的“调和论”曾对李大钊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实际上,无论是“互助论”还是“调和论”,都属于社会改良的范畴,李大钊也曾进行过积极的实践,组建和领导了“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村主义运动”,甚至也曾在胡适倡导的“好人政府”宣言上签名。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李大钊逐渐认识到如果不实行根本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改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就不可能实现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夙愿。

面对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是选择调和互助的社会改良路径,还是选择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路径,在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要在不触动旧中国社会根基的前提下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当然,如果针对的是当时少数军阀政客大谈“主义”的虚伪嘴脸,其主张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李大钊却指出了胡适改良主义的症结所在:一是割裂了“主义”与“问题”间的必然联系,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二是忽视了“主义”的重要性,应该既要研究实际问题,又要宣传正确的“主义”;三是指出了“危险”并不是“主义”带来的,而是“空谈”带来的;四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根本解决”的社会革命方案。

事实上,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看是学术争鸣与政见之争,其实质则是处于不同阶级立场、持不同世界观的知识精英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选择之争,反映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的阶级立场、认知水平和利益诉求。李大钊之所以选择社会革命,是基于前期大量社会改良运动失败的事实而作出的理性选择,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巨大理论超越,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让他认识到唯有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彻底摧毁旧中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腐朽的上层建筑,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正如他所指出的:“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2]375

正是由于选择了社会革命而放弃了社会改良,中国共产党才得以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实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从“第三种文明说”到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制度选择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需要依靠什么制度?

这是中西文化论战后期的社会主义论战的主要辩题之一。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敏锐地将目光从欧洲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新生的苏维埃俄国。1918年,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了“第三种文明”的概念。所谓“第三种文明”,就是能够汲取东西文化之长并能克服东西文化之短的新型文明。具体而言,指的是已经发生了十月革命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俄国的新文明,暗喻了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人类未来文明的趋势。在他看来,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在文化上兼具东西文明之长。“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2]332更为关键的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已经打破了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将权力归于人民,实现了真正的人道和自由。当然,此时的李大钊尚未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俄国又刚刚成立,故此他并未对“第三种文明”进行更多的阐释。但是,在国内思想界仍然纠

缠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并陷入了东西文明的“地域之争”和“种族之争”时，李大钊却站在了更高的制度范畴来审视文明的先进性，这样的远见卓识的确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所罕见，也隐喻了未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制度取向。

诚然，“第三种文明”是李大钊开始关注俄罗斯文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初所提出的观点，更多的是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热烈期盼的真挚表达。而当李大钊逐渐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谙熟之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才更加深刻。李大钊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明确指出了中国未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历史性转向，马克思主义成为显学。但是，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实业才能救国，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人则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于是发生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他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不仅弱小，而且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工业不振、农业凋敝；有钱人不懂得资本利用的原理，只会坐吃山空，从而得出民族资本零碎散乱无法振兴实业的结论。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建立“平民专政”将资本强行搜集起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大办实业。如果仅凭中国资本的“零碎散乱”，不仅办不成实业，更有沦为“外国资本家的掌中物”的可能。所以，李大钊断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3]354 同时，李大钊还敏锐地发现了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萌发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他指出：“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5]248 这也是党内最早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萌芽的论述。

总之，李大钊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在理论上完全超越了“第三种文明说”，坚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选择社会主义制度。

五、从“新亚细亚主义说”到国际主义——科学回答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世界意义

中华民族复兴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提倡“和为贵”“协和万邦”的理念。李大钊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特别剔除了西方民族主义中的侵略扩张成分，主张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同时要为世界人民造福。

首先，提出民族平等，反对民族侵略和压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使李大钊认识到西方列强常以民族主义之名行侵略扩张之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于是世界之中，有所谓大欧罗巴主义焉，大美利坚主义焉，大亚细亚主义焉，大……主义焉；……。故‘大……主义’者，乃专制之隐语也。”[2]344 针对日本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犀利地指出其本质就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和“大日本主义的变名”，认为其必定给亚洲人民带来灾难。对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的概念，指出“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2]381。李大钊不仅驳斥了日本学者浮田和民提出的表面上以中、日联盟为基础，实质上是维持日本对中国侵略现状的主张，而且明确提出了“以民族解放作基础”的正确主张。换言之，“新亚细亚主义”主张亚洲所有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解放并平等地与欧洲、美洲鼎足而立，共同创造美好的世界。虽然关于构建“世界联邦”的构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却与当前我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

其次，强调了中华民族之于亚洲和世界的责任。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如何？这也是李大钊深入思考的问题。1882 年，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6] 也就

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民族独立为前提。中国革命的本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其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当时的世界革命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广大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另一个是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因此，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在革命的对象、任务和目标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说明不仅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更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李大钊提出的“新亚细亚主义”认为中华民族具有“亚洲大局之柱石”的地位，并具有“领导亚洲自强于世界”的责任，期盼中华民族能够“以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俾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2]155。但是，“新亚细亚主义”还没有上升到国际主义的高度来看待世界革命问题。

再次，升华了中华民族复兴对于世界的重要意义。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这些观点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最终，李大钊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领导者地位，将中华民族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找到了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他指出：“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7]19 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不是封闭和割裂的，而是与世界革命紧密联系的，如果不把中国革命放置于世界革命的大局中，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样的认识是有充分依据的。李大钊曾将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译成中文并以《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为题在国内发表。他指出：“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7]143 事实也证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复兴与世界大同的高度统一。事实上，只有将中华民族复兴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洪流当中，将实现民族复兴与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价值追求相结合，中华民族才能作为走向世界大同的“先行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超越一时之成就而具有长远意义、超越一国之范围而具有世界意义。

六、结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李大钊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在心中深深植入了“民族复活”的种子，高举“青春中华”“再造中华”的旗帜，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但是，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无法给予中国人民真理性的指导，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也无法植根于中国社会环境。当时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个“伪民主、真独裁”“伪共和、真专制”“伪统一、真分裂”的封建军阀主宰的反动国家机器。直到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实现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李大钊在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实现路径、制度选择和世界意义等方面构建起了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基本框架，代表了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复兴的理论思考与认识水平。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李大钊不可能很全面或者很精准地回答所有关于民族复兴的理论问题。但重要的是，李大钊等伟大先驱并非“为理论而理论”，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奔忙于社会广阔天地的革命实践家而不是封闭于书斋里面的专职理论家，其进行理论创新不是为了构建某个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历代党的领导集体都不断丰富和拓展党的民族复兴理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第三次历史决议总结概括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即“十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出了“五个必由之路”。这些理论成果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思想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是对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实践的规律性把握，也是指导民族复兴走向成功的科学指南。与建党初期相比，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已经从不自觉、半自觉发展到完全自觉，其理论创造的速度（下转第 37 页）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文化上积极推动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以百花齐放理念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在积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坚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并为应对复杂交织的全球性难题与西方现代化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此外,中国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经验、新机遇、新助力,自觉尊重与支持各国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将持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与发展水平的国家共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美好世界,真正践行马克思的全人类解放的理想追求。

五、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应用,使得中国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不仅消解了资本逻辑的弊端,创造了巨大的现代文明成就,更衍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新形式,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提供了独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与宝贵经验,彰显了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科学性、价值性与强大生命力。因此,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必须坚持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进而超越西方的发展逻辑,规避其现代性缺陷,为中国真正实现现代性特别是人的现代性提供至善至美的思想观念、原则方法及科学指导。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

[6]　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2.

[7]　李进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现代性与续写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09.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36.

[1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

[11]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2).

(责任编校:于博艺)

(上接第 14 页)更快、力度更大、程度更深,这也表明了一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成熟。因此,我们必须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有如此,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中华再造"和"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第二次大贡献"的历史宏愿才能够如期实现。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2]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2.

[7]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校:于博艺)